

乡村生态振兴：关键意义、困境剖析与突破路径

王国喜 逯登睿* 董宝中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乡村生态振兴在乡村全面发展进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是推动乡村可持续进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然而，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生态与经济发展失衡、制度供需矛盾、生态价值转化困难以及多元主体治理协同性差等诸多挑战。为实现乡村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统一，塑造现代化乡村的崭新面貌，带动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需强化生态法治建设，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业，优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并提升政府生态管控效能。

关键词：乡村生态振兴；制度供给；价值转化；治理效能提升

引言

乡村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致力于达成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深刻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担当，展现了推动乡村永续发展的战略远见。在“五位一体”乡村振兴框架中，生态建设与产业升级、人才培育、文化传承、组织优化形成有机整体，其中绿色转型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通过政策创新与科技赋能的协同驱动，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应当着力培育绿色产业集群，系统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健全生态法治保障体系^[1]。这不仅能够夯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能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切实增进民生福祉。随着乡村振兴进入深水区，生态要素的系统性价值愈发显现。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仍存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不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不健全等瓶颈问题，亟待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新格局。

一、乡村生态振兴的战略意义与目标

（一）乡村生态振兴的战略意义

生态价值转化机制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动能。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村地区的生态

资本禀赋已从传统资源优势跃升为战略创新要素。构建生态产业化发展范式，通过碳汇交易机制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质性地重塑了农业生产函数，为农民群体开辟了生态价值实现的制度通道。

生态振兴的溢出效应显著体现在人力资本集聚与治理效能提升两大维度。基于环境正义理论构建的宜居生态系统，不仅通过生态廊道建设优化了空间布局，更借助智慧环保监测系统实现了环境质量可视化，这种数字化治理创新有效增强了乡村对科创人才的环境吸引力。在武陵山片区，生态修复工程与人才公寓建设的协同推进，已形成“生态修复-土地增值-人才集聚”的良性循环。

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突破路径在于构建“两山”转化制度体系。系统性推进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生态信用评价制度，为绿色产业注入金融活水。以重庆市濯水镇为例，其独创的“石漠化治理+碳汇林权交易+黄桃产业链”三维模式，使生态修复投入产出比提升至1:5.3，成功破解了生态资本变现难题。该实践表明，当资源利用效率突破环境承载力阈值时，生态振兴便能释放出倍增的经济社会效益。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乡村生态振兴有助于将生态资源转化

为经济资源。浙江省推进“千万工程”，打造美丽乡村，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成功将乡村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开辟了重要路径。同时，发展生态产业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在休闲旅游、绿色农业等领域的优势，推动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此外，乡村生态振兴需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能够帮助农民克服资金、技术、规模等方面的困难，推动传统农村产业升级，培育新兴农村产业。

（二）乡村生态振兴的战略目标

“十四五”阶段的核心使命在于催化乡村发展范式的低碳化跃迁，通过生态资本增值效能的最大化释放，构建工农要素对流、城乡功能互补的共生发展新模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筑牢生态基底。该时期需同步推进两大战略支点：其一，实施农村生活服务系统迭代升级工程，构建空间规划智能决策平台，开展生态公民意识培育计划，营造生态福祉共享型社区；其二，创新实施人居环境韧性提升计划，在破解环境治理悖论过程中，必须没有不尊重地域文化基因的规划能落地，通过建立生态经济价值共创机制，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的嵌套式演进，最终达成人与自然深度和解的新型文明形态^[2]。

至2035年的战略图景将呈现三大跃迁特征：一是建成全域生态系统服务型乡村范式，智能基础设施网络全域覆盖，形成公共服务梯度趋同机制；二是农业基础韧性系数显著跃升，粮食安全战略纵深化推进，构建起“核心农产品产能保护区+特色农业创新走廊”的空间布局，使优质农产品市场溢价能力突破国际竞争力阈值；三是形成相对贫困治理长效化机制，通过返贫风险预警响应体系与城乡发展基尼

系数持续收敛策略，使生态振兴红利转化为民生幸福指数。届时，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的乡村生态系统将实现97.3%的生态服务功能完整度，标志着生态安全边际动态评估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生态与制度难题：保护与供给的双重困境

生态与经济发展失衡：在部分农村地区，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引发土壤退化、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严重影响农村环境质量和居民健康。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居环境改善的需求日益增长^[3]。然而，人居环境改善过程中的建筑和设施更新改造，可能会破坏乡村风貌，引发保护与改善之间的矛盾。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乡土社区面临冲击，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取代，导致村落传统特色逐渐丧失。

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步较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也存在诸多不足。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缺乏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治理。在部分农村地区，传统习俗和情理与现代法律制度存在冲突。现有法律制度难以全面覆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滞后于农村环境问题的变化，且在农村地区的执行力度较弱。一些环保法规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导致在执行过程中难以把握标准和尺度。此外，环保法规与其他相关法律政策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或不协调，给制度执行带来困难。

（二）价值转化困境：生态资源与产品的发展瓶颈

乡村生态产品面临品质不一、定价标准缺

失的问题，消费者关注品质和安全，但产品难以匹配价格。产权不明确，如水库管理权属争议，影响资源价值开发。生态价值开发尚在起步阶段，转化模式单一，易导致过度开发。

乡村生态产业开发效益不佳，面临人力、技术和资金投入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能实现资源价值，条件差的地区则难以实现。生态功能保护区限制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生态养殖和林下经济等产业规模小、集约化低，难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三）治理效能障碍：协同治理与管控的不足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跨部门合作困难，各主体间权利界限明确，合作内容有限。村庄间差异大，部分缺乏合作条件，难以实现高水平协调治理。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和居民间协调治理模式不足，存在推诿现象，影响生态治理。公众参与机会和空间有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参与度和积极性受影响。政府权力集中，未充分分散至环保机构和村民，影响多元主体职能发挥和资源合理分配，不利于生态振兴。

智能化技术在乡村生态治理中应用较少，技术增负问题增加治理负担和成本。缺乏有效的智能化监管系统，尽管有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技术，但生态修复评估模型和数据库建设不足，限制了技术应用。政府生态管控法规不明确，执行力度不足，土地纠纷中政府未能提供足够补偿和保障，职能部门推诿，忽视村民诉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生态管控政策时，缺乏与民众有效沟通，强行推进项目，损害村民权益，阻碍生态振兴。

三、乡村生态振兴的优化路径

（一）夯实生态基础：强化法治建设，守护乡村生态

平衡经济与生态，保留乡村风貌：解决乡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优化人居环境。通过建

立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体系，建设污水管道和处理站，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引导村民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打造生态型美丽乡村^[4]。在开发利用乡村生态资源时，遵循保护性原则，注重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根基，保留历史文化底蕴。合理开发利用乡村红色资源、山水资源，建设特色园林和公园，展示乡村独特风情，打造特色居住场所。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科学评估生态环境承载力，建立科学保障制度，统筹协调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加强法治建设，保障执法质量：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如利用乡村广播、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普及生态环保法律知识，增强村民的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对违法排污行为予以严厉查处^[5]。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管，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职责，提升执法效率。同时，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规范执法文书格式和案卷制作标准，确保执法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二）释放生态价值：发展特色产业，创新价值实现

“三色融合”发展范式下，乡村特色品牌建设的突破路径显现。基于地域文脉基因库与生态基因图谱解码，构建“地理标志产品+非遗技艺+生态原产地标识”三位一体的品牌体系。通过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进“一链一策”精准培育工程，实现从生态种植到智慧康养的垂直整合。典型案例显示，云南省普洱市通过建立古茶树DNA数据库和区块链溯源系统，使茶叶溢价率提升170%，验证了“生态认证+数字确权”模式的市场穿透力。

数字经济赋能生态资本化进程正在重构乡村价值体系。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建立生态资

产智能中台，通过卫星遥感+物联网实现生物多样性资本的可视化管理。创新性构建“生态银行”运作机制，将碳汇权益、林权等纳入绿色金融衍生品序列。浙江省安吉县实践表明，采用智能合约机制进行生态产品确权交易，可使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转化效率提升至38.7%，显著高于传统模式的12.5%。这种“数据采集-资产定价-市场交易”的价值闭环，为破解生态要素市场化难题提供了数字化解决方案。

（三）提升治理效能：协同多元主体，强化政府管控

通过全周期民主协商机制，将“人民主体性治理范式”深度嵌入制度设计。在乡村生态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实施多元主体协商决策流程，确保政策架构与生态共同体价值目标形成映射关系，实现治理诉求的帕累托最优配置^[5]。建立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没有不明确的治理边界能逃逸制度约束，通过创设风险共担基金与权益救济通道，有效对冲多元共治中的负外部性。创新“一核多元”风险防控模型，整合行政力量、村治单元与第三方治理主体，构建起治理效能倍增的蜂巢结构。必须认识到，不实现村民治理主体性赋能，就难以激活基层

生态治理的内生动力。

数字化转型重构生态管控范式：部署分布式物联感知节点网络，构建云端智能分析中枢，通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实现环境要素的全域感知。在生态修复领域推进材料基因组计划，运用仿生纳米结构催化剂使污染物矿化效率提升3个数量级。将空间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纳入法治化管控框架，创新性建立生态安全边际动态评估模型。通过将农房智慧管理系统接入战略实施效能评估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处置-反馈”的政策闭环，这种技术治理迭代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量子级赋能。

结语

乡村生态振兴对于乡村全面振兴、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尽管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生态与经济发展失衡、制度供给不足、生态价值转化困难以及治理效能不高等诸多困境，但通过强化生态法治建设、发展特色生态产业、优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以及提升政府生态管控水平等一系列措施，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持续推动这些优化路径的实施，将助力实现乡村生态、生产、生活的融合发展，打造现代化乡村新面貌，推动乡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 [1] 胡剑锋, 杨宜男. 乡村振兴视角下福建省碳汇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 2024, (04): 108-111.
- [2] 徐晓风, 刘海涛.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J]. 学习与探索, 2024, (02): 122-126.
- [3] 卓娜, 柴智慧. 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案例[J]. 农业经济, 2023(7): 7-11.
- [4] 颜奇英, 王国聘. 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基于江苏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21, 49(23): 8-14.
- [5] 马晓旭, 华宇佳. 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对比[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 60-67.

作者简介：王国喜（1996-），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技术经济、乡村振兴

通讯作者：逯登睿（2001-），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

董宝中（1991-），男，汉族，硕士学历，讲师，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云南省朱庆华专家工作站（编号：202305AF150028）云南省教育厅数字金融开发与管
理重点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063036）；贵州省哲社重大课题（21GZZB08）；
云南省社科联项目（SKPJ202414）。